

中国历史

两晋南北朝史

严耀中 著

人民出版社

中国历史

两晋南北朝史

严耀中 著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历史·两晋南北朝史 / 严耀中著.

-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9

(中国历史 / 张秀平 关宏策划)

ISBN 978-7-01-007713-0

I. 中... II. 严 III. ①中国—历史②中国—古代史—
两晋南北朝时代

IV. K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16686 号

中国历史·两晋南北朝史

ZHONGGUO LISHI LIANGJIN NANBEICHAOSHI

作 者: 严耀中

选题策划: 张秀平 关 宏

责任编辑: 张秀平 任文正

封面设计: 徐 晖

版式设计: 陈 岩

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 址: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装订: 永恒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出版日期: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30 毫米×970 毫米 1/16

印张: 30.125

字数: 480 千字

书号: ISBN 978-7-01-007713-0

定价: 65.00 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有奖举报电话: (010) 65251359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电话: (010): 65250042 65289539

目 录

第一章 绪 论	1
第二章 西晋,短暂的统一	11
第一节 西晋建立与全国统一	11
第二节 一统天下后的社会隐患	19
第三节 从“八王之乱”到“永嘉之变”	28
第三章 门阀与东晋政治	41
第一节 司马氏南渡与东晋政局	41
第二节 门阀与门阀政治	59
第三节 移民与流民	75
第四节 社会阶层的分隔和“专役户”	88
第五节 从谈玄到玄学,社会演变中的 思想轨迹	101
第六节 道教、佛教及民间宗教	113
第四章 十六国纷争与民族问题	130
第一节 中国古代的民族问题及其 在两晋南北朝的特点	130
第二节 十六国兴亡	142
第三节 苻坚南下和淝水之战	162
第四节 中西交通和北方两侧的边地形势	170
第五章 南朝政治与社会	181
第一节 宋、齐、梁、陈更迭与“禅让”制	181
第二节 侯景之乱及其前因后果	197
第三节 在变动中形成的各种行政制度	205
第四节 “寒人掌机要”之背景	218
第五节 崇佛与灭佛,僧官制度及 三教会通局面的形成	226
第六节 岭南、西南地区的经略	239

第六章 平城至洛阳:北魏皇朝的兴衰	253
第一节 拓跋鲜卑,一个游牧行国的兴起	253
第二节 北魏开国与定都平城	261
第三节 北中国的统一与开创性的政治体制	269
第四节 南北对峙下的北魏政治	277
第五节 均田制及本时期田制的沿革	286
第六节 迁都洛阳与孝文帝改革	302
第七章 东魏、西魏到北齐、北周	319
第一节 “六镇暴动”和北魏分裂	319
第二节 北齐、北周的建立与政权比较	331
第三节 就“府兵制”说魏晋南北朝的兵制	341
第八章 走向重新统一	352
第一节 南北交流、商品经济与一统观念的强化	352
第二节 法的观念与律法的进展	362
第三节 最具人文精神的时代文化	374
第四节 地域与民族融合背景下的社会生活	390
第五节 经学的复兴及其背景	403
第六节 战乱中进步的科学技术	417
第七节 走向重新统一	428
索引(按音序为序)	
(人名、地名、氏族名、国名、历史事件、典章制度)	436
后记	476

第一章 绪论

当我们打开一部历史书时,虽然最初的想法可能是朦胧的“开卷有益”,但如果不是随便浏览的话,应该是有直接之目的。于此,不同的读者,不同的书,以及两者之间的组合,都会有许多不同的答案,可是不管怎样,皆可以说是为了直接或间接地认识历史。

出于为了更好地认识历史,并从中获得益处的需要,便有了历史学。因此历史学不仅是考据之学和义理之学,更是智慧之学,唯此可得最大的好处,史学也才会在现实中体现其最重要的价值。史学有三大任务,第一是弄清历史事实的真相;第二是探索历史现象后面的关联和本质,以为理性的镜鉴;第三是以今天的立场与眼光对历史上对人与事予以评价,从而使史学有了最现实的意义。这三者之间也是互相关联的,但把重心放在哪一个点上,不同的史家和史学著作有着不同的追求。

中国古代史学的智慧集中在对政治之道的讲究上。所谓治道,“按字面讲,就是治理天下之道,或处理人间共同事务之道”。虽然绝大多数人没有担负治理天下的职责,但处理人间共同事务之道却与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相关。中国的治道“已透至最高之境界,在自觉讲习中已达至无以复加之极端微妙境界”¹。而这些智慧的体现,可以二十四史和《资治通鉴》为代表,而它们正是我们今天阐述两晋南北朝史最主要的史料基础。

从次一层面说,因为历史上的事情虽然都已经过去,但来看这些过去事情的人却是随着时代前进在变,横看成岭侧成峰,不同时代的人们在回首往事时,会有不同的情景收入眼底,把这些情景进行比较与说明,其实也是一种历史研究。当然史学的境界并不止于此,通古今之变,



晋武帝司马炎像

¹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第2、1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22页。



青釉仰覆莲花尊（南朝）

究天人之际应该是史学更高的追求，由此也会体现出人间更大的智慧，即通过对各种真相的揭示和对其前因后果左关右联之探求来把握正确思维，以明人道的本真和天道的深邃。

两晋南北朝史作为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一段，而且是自秦以后非常独特的一段，有着和其他断代或朝代明显不一致的东西。譬如说，其他时期的国家形态基本上以统一为主，本时期则主要呈现的是分裂状态。因此说清其如何承前启后，无疑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那些在当时来说是轰动的或重要的事件，还要看明白那些对以后历史发生影响的东西，因为这样更能廓清历史的脉络，得出历史的智慧，即古人所谓“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¹。这也是作者努力要在本书中所达到的一个主要目的。

文献史料中所呈现的本时期历史是复杂多变的，在三百多年的历史里，除了西晋短暂的统一，其他都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国土的分合，朝代的鼎革，当然是有着很多偶然的事件来加以促成，但并非毫无轨迹可言。譬如纷杂表象后面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和汉晋之间人口的大量丧失而为秦以后人口最稀少的时代相关，以及由此使人力资源成了社会生产、乃至大多数政治制度形成和政治事件展开的关键点，于是对人的控制与反控制、利用与反利用、剥削与反剥削构成了本时期历史的主要画卷。中国古代以农立国，财政税赋主要来自于农，而当时农业的发达又主要靠劳动力的投入。汉末以降战乱导致人口稀少，直接后果之一，就是行政资源的匮乏，无力迅速重建一个专制集权的统一国家，承担不起一个强大行政机器所需的建设和运行成本。只有人口及以其为基础的农业几经曲折慢慢恢复后，才会显示出大帝国的统治模式在行政效费比上的可接受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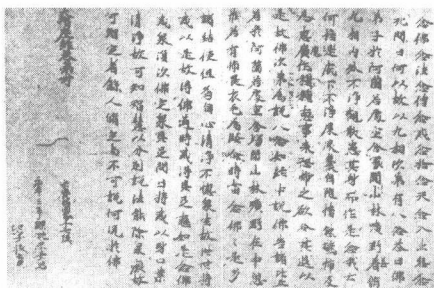
站在这个角度来观察两晋南北朝的历史，我们就可以找到本时期社会最重要的特征——门阀之兴衰的关键点之一，其实这个过程也是由行政系统运行的成本高低决定的。门阀政治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皇帝专制集权对

¹ 《颜氏家训·勉学篇》。扩展行政系统的资源需求，由于用扩大家族结构和能量

的方式来实行统治,并维系社会之稳定,所以在朝廷上和地方上的行政运行对国家财政的耗费都相对较小。因此门阀的兴衰起落实际上与行政系统的运转关系重大,它应行政系统的扩展而产生发展,以把持军政权位而势倾天下,又因脱离政务而走向式微。门阀制度也呈现出一种政治与文化相交错的“家世文章,甚为典正”¹之独特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下,由于“自魏正始、晋中朝以来,贵臣虽有识治者,皆以文学相处,罕图庶务”²。无心插柳,竟促成了中国文化发展的一次高潮,玄学的兴起,佛学的扩展,经学的演变,诗文与史学的繁荣都离不开门阀士族,本时期名士们的文集竟多出两汉十倍以上!这正是两晋南北朝历史进程中的魅力所在。

门阀不是一般的豪强大族,更不是一般的所谓地主,门阀兼有官僚世家和文化世家的双重性,是当时社会里的精神贵族。魏晋南北朝是门阀时代,与此对照,东汉是前门阀时代,经学起家出过“四世三公”的袁氏和杨氏就是门阀,隋唐是后门阀时代,五代是门阀的终结。门阀之所以得势,另一个关键点就是他们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下基本垄断了教育。大一统的专制集权行政系统需要有相当一批文化专业人士来操作运行,自西汉开始各级学校教育就是为了适应这样的需要而发展的。由于只能书写在竹简上的书籍稀少,文化知识的承袭,尤其是其精髓的领会,主要只能以口口相传的方式来进行,而其最精华部分的传授往往在其父子之间,于是就有了家学的发达和经学世家的出现。由于当时学问的评估只能出于老师之口,而名师之言便是评估的最高标准,也由于中国的学问是讲究知行合一的,这正是为培养行政官员所必须,师长的评语又成了入仕的重要条件,学而优则仕于是就有了一种新的模式。这样也就构成了文化世家与官僚世家合一的基础。汉魏之间“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余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³。经过门阀时代的高峰,梁时一介武臣曹景宗尚能依韵即成“去时儿女悲,归来笳鼓竞。借问行路人,何如霍去病?”⁴这样的好诗,文化世家所造成的社会氛围不容小视。

两晋南北朝时纸的应用慢慢普遍,书籍越来越多,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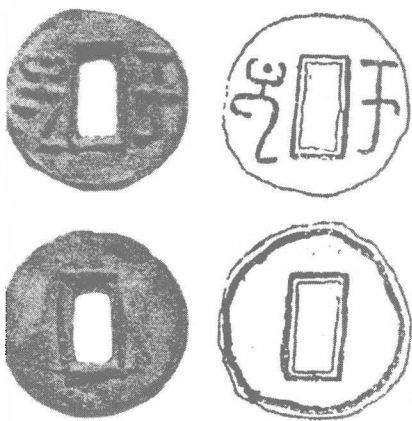
北魏永平三年纸写本《大智度论》

¹《颜氏家训·文章篇》。

²《陈书》卷6《后主纪论》。这里的“文学”非仅指诗文,系最广义者。

³《三国志》卷13《王朗传附王肃传》注引《魏略》。

⁴《南史》卷55《曹景宗传》。



大英博物馆藏于闐五铢钱及 J. Cribb 摹本

式从卷轴转化成簿本,甚至有了“巾箱本”之类便于阅读和携带之书,惠受文化教育的范围也更加广泛,文化垄断地位的淡化应该也是门阀消沉的原因之一。有了足够多的知识阶层成员,采取以考试为主的官吏选拔方式才有采用的可能与必要,我想这就是自隋开始有科举制度的一个重要背景。但因为抄本的使用与流通毕竟有诸多不便,所以取得知识一致的范围也不可能很大,唐代科举的名目那么多,像举进士这样重要的科目依然少不了推荐,恐怕都与此相关,门阀也还有着残存的余地。等到唐末两宋印刷术的普及,学校的教育可以有统一的内容,全国性的考试可以有统一的标准,这些都符合专制集权政体的需要,由此宋以后的科举就进入了体制统一的时代,门阀制度才彻底失去了它存在的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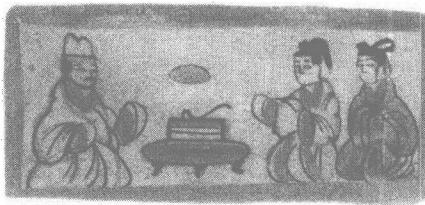
本时期的各代朝廷的政治虽然多多少少地被门阀左右着,这当然最有利于那些世家大族,但这并不等于朝廷仅代表着那些世家大族,哪怕是在门阀政治最突出的东晋。那是因为国家作为一个整体,它必须以所有各组成部分的存在而为自己存在的条件。由于任何部分利益的绝对缺失会导致该部分的消失,从而使国将不国。晋代一位名叫刘弘的官员于治国方略有很深的体会:“夫统天下者,宜与天下一心;化一国者,宜与一国为任。”¹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将部分或全部丧失治理国家的资格,因此朝廷在社会冲突中,虽然有时会有所偏袒,但也不会完全不顾其他方的利益。诸朝政府功能发挥得好坏,在于它能否认识到它本身长远和正确的利益。一个政权如果能依据其根本利益而能很好地调和社会各部分的利益,它所施行的就已经是先贤所谓的“仁政”了,因为仁政作为一种有远见的理智行为也有利于它自身。

与此相关的是门阀占统治地位下的社会结构,和中国历史其他时期的情况有大体相同之处。在以家族为本的社会里,家族内部的结构被放大到社会,家族中或氏族之间的等级就演化成社会等级。就如在家族中,辈分是决定地位的重要依据,而通过辈分是不能把族众简单地分成对立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某人是儿子也是父亲,他在家中处于什么地位?晋代的王裒出身士族,自己是名

¹ 《晋书》卷66《刘弘传》。

士,《晋书·王褒传》说他“家贫躬耕,计口而田,度身而蚕,或有助之者,不听”。这样的人物是很难简单作阶级归类的。又如西魏北周“公卿逮于民庶之家,有獠口者多矣”¹。长沙走马楼吴简和敦煌文书中都有很多庶民畜奴记载。从题为“西魏大统十三年(547年)瓜州效穀郡计账”的敦煌文书(S·613)中所载户口籍账来看,一些有一、二个贱小婢、贱丁婢的人家都要种田自食,课租服役²,可见他们至多是属于庶姓农民一类,那么这些有獠口、贱婢的庶民算统治阶级还是被统治阶级?还如本时期有些专役户出身的人,虽然属于社会中的低贱者,但他们可以很富,也可以做官。这就如清代的“包衣”,他们在王府中是奴才,出去可以做一方的父母官。因此无论是三代时的“人有十等”,还是本时期复杂的户等,笼统地要将社会上所有的人一分为二,非彼即此,是从概念与教条出发,罔顾历史事实。现实的世界是由于有了差别才浮现出来的,各类差别愈多,这个世界也就愈显得丰满。中国古代历史之精彩,就是它的社会里有着千差万别,如民族、阶层、地域、家族及各种利益集团等等,就是在高门内部也要分出层次来,如琅琊王氏中居马粪巷一支就要高于住乌衣巷的一支³。这些社会差别犹如二、三部并列而时有交错的阶梯,其最高端与最低端虽有天壤之别,但如果我们把那阶梯断为相对两截,小视或无视其他许多差别的存在与作用,那么所谓史学就可能只是一些贴在白纸上的干瘪标签。而那些大大小小的差别中间的某个特别扩大起来,就有可能构成了当时产生大事件或危机的温床。各式各样的差别的生灭与转变,给了历史学丰富的研究对象。

一个时代的特征总会与同时代的一些其他特征相关联。众多田制的纷纷呈现,也应该是魏晋南北朝史上的一个亮点,因为均田制在隋及唐前期的存在虽然引人注目,实际上只是本时期制度上的一种延续。几乎所有治中古史学者达成的共识是产生这些田制的一个背景系人少地多,由于有人始有土,有土始有财,因此推行这些田制的一个直接动机就是要在如此情形下保证朝廷的赋税收入。在以农立国的古代,这些税赋收入的有无多少,决定着朝廷的存亡强弱。同时,伴随着人少地多的现象,是门



士族生活画像石

¹ 《周书》卷49《獠传》。

² 录文见唐耕耦、陆宏基编《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辑录》第1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112-126页。

³ 朱大渭先生很仔细地把当时的阶级结构“分为二十四种类别、三个等级、六个阶级”,但最后归入“两大阶级营垒”,又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了。见其《魏晋南北朝阶级结构试析》,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士族妇女出游画像砖(南朝)

阀豪强对劳动力的荫占。朝廷通过一些土地分配耕种的形式(屯田、占田、均田等),将这些土地上的劳动者定格为国有,也是一种防止高门大族对其侵占的有效措施。从这点上说,这些田制与本时期各种专役户之形成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对当时中央朝廷而言,保证赋税收入是第一位的要务,那些田制只是为了适应彼时形势来保障赋税收入的不同操作方案和手段,是属于第二位的,如占田课田制仅是户调式的一部分内容。这在以战争频繁而特需物质支持的本时期各个政权来说,当然显得尤为要紧。

如果上述看法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关于中古时期的各种田制还可以说明四点。一是这些田制的订立和推行,完全是功利性的,和《孟子》中论述的井田制在本质上差异颇大,后者包含着追求社会和同的蓝图。因此前者的倾向是经济性或至多是实用政治性的,后者的倾向是政治理念型的,也决定了前者都是可以操作执行的,后者只能作为一种少数政治家和学者们的憧憬。虽然一些田制在订立或实施时总是要把井田制拉来作依据。事实证明,本时期的各种田制都不影响私人的土地所有保有,也间接说明了这些田制并不杂有政治理想,不是一种土地改革,也没有在实际上起到抑制土地兼并的作用,兴师动众只是为了取得租赋而已。因此当维护田制的行政成本高时,或者更简便的税收方式如二税制出现时,田制就被放弃了。二是各种田制在操作上都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若屯田中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分成,课田制可以转化为度田收租制,均田制可以选择地域执行¹,按实际情况给田,甚至默许土地转让,只要能保证税收就行。三是南朝“军国所须杂物,随土所出,临时折课市取,乃无恒法。定令列州郡县制其任土所出,以为征赋”²。除了“其国用注重于关市之税”³外,依靠着在商品经济相对发展的基础上设立的“治、署、邸、肆”之利⁴,所以江左诸朝都未曾在田制上下大工夫。四是因为以本时期为主的各类田制出现是为了保障朝廷赋税收入服务的,所以当一些妨碍收入的时代特征转弱或消失时,如人口增长、门阀解体、外境平和等,朝廷收入就不需要田制来保障,它就没有必要存在了,一如我们在秦汉和唐中期以后的历史里所看到的。

¹ 如程应镠先生认为“北魏在畿内和近畿地区没有实行均田令”,见其《论北魏实行均田令的对象与地区》,载《流金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还如很多学者都认为唐代没有在江南推行过均田制。

² 《隋书》卷24《食货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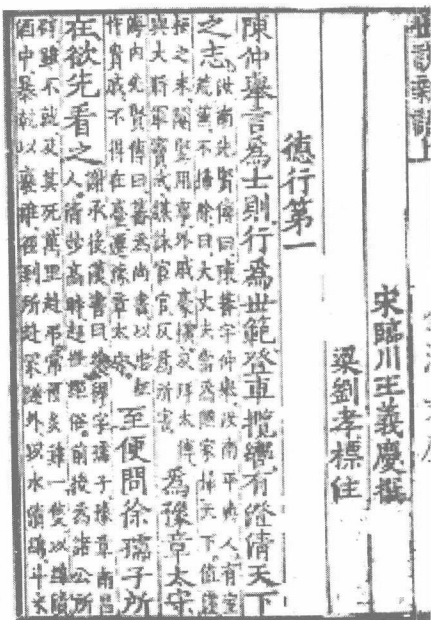
³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44页。

⁴ 关于邸店之利,在北周末,“收利如食千户”,见《隋书》卷42《李德林传》。可为参考。

本书的重点在于注意到文化在历史演变中所起的作用。文化的影响虽常无形而迟缓,但深沉而不可抗拒,凡肆意践踏文化传统之狂妄举措最终必被传统文化的力量所粉碎,当然这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文化从广义上说,是人类所有活动的总和,狭义的文化虽然被局限于意识形态,甚至只是在上层意识形态的范围内,但一切政治、军事、经济的活动无不受到社会意识观念的牵连,因为一切历史事件都是由人的行为构成的,而人的行为说到底都是人的本性和人与人之间互相关系之表现,其中很多现象是无法单纯用物质利益牵动能解释得清楚的。因为人们在一个时代中的举止行为,都会受到这个时代意识流所影响,也就是受这个时代的文化所影响,当然文化本身也会受到社会其他方面的反影响,如本时期之胡汉、士庶、良贱,乃至东、西之文化宗教,南、北之社会政治等等差别的突出,大大刺激了人们的感受。这里所谓感觉,就是作为主体的人对各种差别的反映,身处社会上和自然间的差别愈大,感觉就愈强烈,文学艺术作为感觉的表露,也就鲜明而深切。而了解与勾描这些影响和反影响的交流渠道,正是史学工作者的一项重要任务。

两晋南北朝是秦之后的历史上情况最复杂的时期,社会上各种矛盾交错纠缠,大大小小的政治实体合纵连横,包括首尾相关的《三国志》与《隋书》,二十四史中竟有一半是以本时期为对象的。这种复杂的情况包括意识和政治上的权威之崩溃与重建。也正是这种崩溃与重建,构成了本时期特有的人文环境。由此也引起对人性、人世和人生价值的深入思考,于是有了玄学和经学的分解与结合、佛教和道教的发展与演变,也使文学与史学更为清新而隽永。

从两汉僵化的经学中脱胎而出的玄学,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一大思潮。玄学虽然对经学构成了冲击,但所谈之“三玄”,实质上是以易学为结合点,将老庄之学中的一些思想观念加以发挥改造,用来对儒家的名教进行重新诠释,注入新的思维动力。因此在玄学开展的过程中,很难说清楚它究竟是姓儒还是姓道,重要的是玄学为当时的社会行为准则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这个使命完成了,



《世说新语》



保定元年(道民)马洛子造像铭记拓片

它本身的存在反而失去了依据,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现之昙花。至于它在当时政治社会中所产生的副作用,如裴颢在其《崇有论》里所说的那样,“立言藉于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散其廉操,谓之旷达”,是不能归咎于玄学本身的。

本时期意识形态上的大事还在于宗教的兴盛。经学的僵化,皇权的削弱,以及人口大量丧失所引起对生死命运的严重关注,都为宗教在本时期得到广为流播与繁荣创造了条件。永嘉之变后对汉人出家的解禁和两晋之间与玄学的结合使佛教在中土就此站住了脚跟,并由此开始了所谓三教合一的进程。凡是历史上既有的东西都是合理的东西,宗教固然有它的弊病之处,但是没有任何意识形态能完全取代它,因为它对社会起着多种必不可少的作用。两晋南北朝时代中强化了了的佛教与道教,作为全国性的宗教,在多民族存在的本时期,还有助于把各族的文化观念融合与一致起来¹。这一积极作用,往往是被前人所忽略或叙说不多的。虽然人们为着生死与命运在宗教中寻找答案,但一般的宗教只是展示人如何超越死亡,因此还得依靠神和崇拜神以求永生。而华夏主流的宗教意识所追求的是物我合一,泯灭存亡两限,以此超越生死,所以其永恒所在,求己而不求他。佛教“法我皆空”所达到的思想高度,仍是迄今为止其他宗教所难以逾越和企及的。

民族间的冲突与融合,也是与本时期历史的很多方面相关联。但当时绝大多数的民族差别不在于体貌特征,而在于文化心理,所以“当时之所谓胡人汉人,大抵以胡化汉化而不以胡种汉种为分别”²。即所谓“首不加冠,是越类也;足不蹶履,是夷民也”³。通过考古所得人骨之科学鉴定,“无论是汉晋时期的鲜卑人、辽代的契丹人还是元代或近代的蒙古人,在种族人类学特征上的确是颇为一致的,均属于低颅阔面的西伯利亚蒙古人种”⁴,从而证明他们都与汉族有着极近的血缘关系。如果站在这样的角度来理解本时期的民族关系,我们对当时与此相关的政治与军事事件,或许会有更深入的发现。现代对“民族”一词有着不同的理解与阐释,但在中国古代却是很大程度上在于对族群文化特征的整体认定,因为这种文化特征是

¹ 如刘淑芬先生对南北朝期间华北乡村佛教义邑研究后认为“在胡、汉人民,或是不同种姓的胡人杂居的村落里”,“胡、汉人民协力共造佛像这个事实”有助于“消泯民族界线、促进民族融合”。见其《五至六世纪华北乡村的佛教信仰》,载《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3本第3分(1993年)。

²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71页。

³ 《刘子集校》卷2“慎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59页。

⁴ 宋泓《东胡人种考》,《文物》2006年第8期。

其行为准则的基础。“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就是站在这样一个角度来讲的。然而另一方面，民族的融合又都是在各自都认为是黄帝子孙的前提下实行的，如北魏孝文帝下诏称：“北人谓土为拓，后为跋。魏之先出于黄帝，以土德王，故为拓跋氏。夫土者，黄中之色，万物之元也。宜改姓元氏。”¹由于有着这样的认定，此在本时期非常明显，才在岁月流转中铸就了传信来自于同一人文初祖的中华民族。这是其他文明史所没有的。

在本时期，我们还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实现了不同结果的民族融合，汉人到了游牧地区就“胡化”，而少数民族人生活在农耕区域就必然会是“汉化”。这是因为不同的生存环境决定了不同的生活习俗，而风俗是养成民族心理的重要一环。由于风俗是由习惯来保持的，作为民族的一分子，个人的习惯是深深与民族特点结合在一起的。对一个成年人来说，习惯成自然，在那个时代，从士大夫到普通百姓，自然的东西就被认定是合理的东西，对自然养成的东西，往往不习惯改也不愿意改，这就构成了他本人外在的民族特点。而生活习俗的差异，必然会导致对生活标准和行为准则的歧见，这样，又构成了民族心理的基础，除非生存环境被彻底改变了。因此消解民族排异心理首先要从同一生活习俗开始，然后进一步实行较高级文化上的同一，完成了这一步，融合也就基本成功了，因为在古代中国绝大多数的民族中间，基本不存在难以消除的体貌隔阂。所以在中华历史上，农业化、儒化、汉化三者是步调一致的。

两晋南北朝是一个分裂与动乱充斥的时期，但其最后趋向于统一与融合，不能不归于意识观念的强大力量。天下一家的观念自三代以降在中土就没有被动摇过，汉时天子在明堂祭上帝，“诸侯宗室、四夷君长、匈奴西国侍子，悉奉贡助祭”²，就是天下一家的图景。因而说明夷夏之别的意识是置于“天下”的概念之下的，是属于次一个层面的。这种汉族中的主流意识，随着汉文化的扩展和影响，也被四边的少数民族所接受，更不用说那些进入了中原地域的少数民族。在“天下”这个最高概念之下，任何次级观念里所含有的矛盾，就都有可能得到消解，这就是中国最



交脚大弥勒佛像

¹《资治通鉴》卷140齐明帝建武三年正月条。

²《北史》卷60《宇文贵传》。



蜜丹国使 萧绎·职贡图卷（局部）

终走向统一与和合的一个重要思想基础。同时，在“天下——天子——王土——四夷”的观念构架下，中国古代的“边地”与“边邻”之间的界线极其模糊。随着中央朝廷国力的兴衰和政策策略的转化，边地与边邻之间的地位是经常转换的。其中，类似唐代羁縻州的行政设置之兴废成了这种转换的形式之一，而诸如此类性质的郡县在本时期各朝的四边都已很盛行，这也许是侨置州郡所启发出来因时因地方便置宜的行政体制设计，却对后世的边疆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两晋南北朝对今天来说已经是一个遥远的时代，因此我们回顾这段历史时，一个很重要的冲动是想寻找出那时候的哪些东西沉淀到现在，影响着我们今天的社会生活。我们会为此找出很多：除了我们人体中的遗传基因和我们活动着的那片土地山河外，语言文字、典籍文献、文物遗址，等等，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生活的观念与思维的模式，还有多少留在我们心中。

第二章 西晋,短暂的统一

第一节 西晋建立与全国统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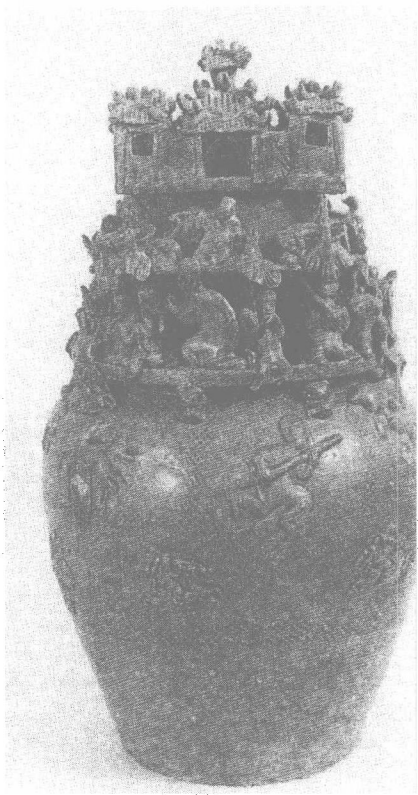
一、西晋的建立

公元265年,司马炎以“禅让”的方式逼使魏元帝曹奂将皇位奉献出来,建立了晋朝,是年定为泰始元年,他也就成了晋武帝。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司马炎能当上开国皇帝,基业却是他祖父司马懿所打下的。公元249年,也就是魏嘉平元年,装病在家的司马懿趁辅政的大将军曹爽与魏帝曹芳去洛阳城南祭祀魏明帝的高平陵之机,突然关闭城门,借太后名义发动政变,尔后设计使曹爽交出兵权,再把他杀掉,并株连了一大批被指认为曹氏同党的文武官员,史称“高平陵之变”。从此司马家族开始把持魏朝的军政大权。

司马懿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司马师和司马昭依次掌握政权。这期间还先后废除曹芳和曹髦两位魏帝,最后立曹奂为帝,形同傀儡。公元263年,时以大将军秉政的司马昭发兵灭蜀。次年,司马昭晋爵为晋王。265年,讽魏帝命其“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蹕,乘金根车,驾六马,备五时副车,置旄头云罕,乐舞八佾”等“皆如帝者之仪”¹。然而就在即将按礼制一步步完成受禅过程时,当年八月司马昭病逝,其长子司马炎在四个月 after,经过一番形式上的礼让,终于“升坛受禅,告类上帝”²,实现了以晋代魏的鼎革大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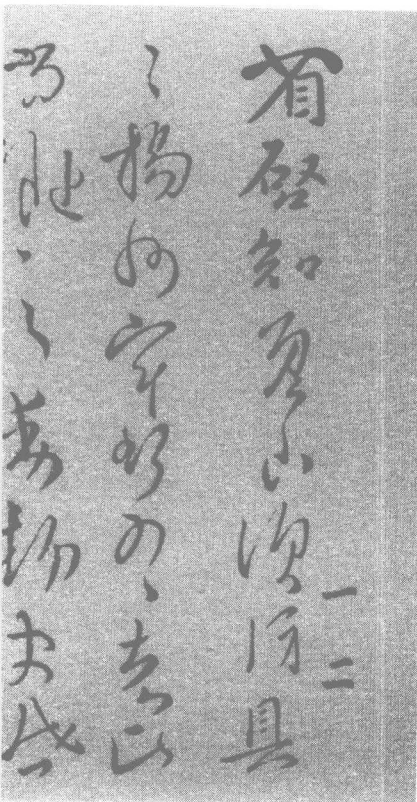
晋朝建立之后,武帝忙着完成以下大事。一是追尊司



堆塑魂瓶(西晋)1979年浙江出土

¹《晋书》卷2《文帝纪》。

²《晋书》卷3《武帝纪》。



晋武帝·省启帖

马懿等祖、父为帝，立皇后杨氏，封宗室为诸王，功臣为公侯，“其余增封晋爵各有差，文武普增位二等”。这是新朝开张所必须做的，让拥戴者都得到好处。

二是创建新朝各种制度：1，“改《景初历》为《泰始历》，腊以西，社以丑”。2，改雅乐乐章词义，这和歌功颂德的具体内容相关。3，大赦天下，颁布新律。“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其“条纲虽设，称为简惠”，也使“海内同轨”。此外还命贾充等撰《晋令》四十篇。其中很突出二点：其一是有关官制的令特别多，除官品、吏员、俸廩等令外，还有专门的散骑中书、尚书、三台秘书、王公侯、选吏等令；其二是与战争相关的多，如军吏员、选将、宫卫、选杂士、军战、军水战，还有八个令全是有关军法的¹。前者是与官制的改革同步，后者反映了当时战事频仍的时代特征。4，“更定元会议”。但司马昭于263年后“命荀顗因魏代前事”，“参考今古，更其节文”，再由羊祜等“并共刊定，成百六十五篇”，十余万言的新礼，竟未能颁定²。5，设立一些有别于汉制的职官。如将东汉的太尉、司徒、司空三公，再加上历代的有过的最高官位太宰、太傅、太保、大司马、大将军而扩展为“八公”。同时还设“从公”，以骠骑、车骑“等大将军，左右光禄、光禄三大夫，开府者皆为位从公”。又将其中太宰等为文官公，大司马等为武官公。“诸公及开府位从公者，品秩第一，食奉日五斛”，还给绢绵、菜田，配置属吏、兵卒等³。上述这些措施并非仅是新朝初建时的一种形式，虽然必须有这些形式才有新朝之新。这些新制一般来说其新之处都是针对前朝的弊病或不足，若八公及诸从公之增设和优厚待遇，是司马氏对官僚士族支持其篡政和执政的报答，同时也使居高位的文武官员有更多的互相牵制，以免别人也走专权篡位之路。即便如此，若旧房子换了新主人，修补一番，增添一些，装饰一下对房子总是有好处的。如果老百姓必须得在这个大房子底下生活，那么对这座房子的改装，就有了意义。但其中礼制系封建王朝政体之基础，新礼不行，说明晋朝在建立之初政体就缺乏足够的活力。

三是建常平仓，制户调之式，立占田课田制等经济措

¹ 参见沈家本《九朝律考》卷3《晋律考下·晋令》。

² 分见《晋书》卷3《武帝纪》，卷2《文帝纪》，卷22《乐志上》，卷30《刑法志》，卷21《礼志下》，卷19《礼志上》。

³ 《晋书》卷24《职官志》。